

# 少年事件處理法安置輔導制度運作 困境之檢討與改革建議—— 以個人之實務經驗出發

何明晃

## 壹、前言

西元（以下同）1997年10月29日，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大幅度增修，其中，在第42條第1項之保護處分中增訂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以下簡稱安置輔導）一款，可謂落實轉向（註1）精神之具體措施。而如今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運作已逾10年，其間，固不乏關心此領域之學位論文與實務研究（註2），但似乎可以看出，大部分之研究或論述，均建構在認同安置輔導之前提基礎上。

少事法安置輔導制設計之初，確有其欲達成之目標與時空背景因素（註3），從表一所呈現之資料亦可發現，近幾年來，每年平均約有150人次之兒童或少年經由各少年法院（庭）依少事法裁處安置輔導之處分，且實際運作過程中，更不乏透過安置輔導處遇，使得非行兒童或少年

回歸正途之案例。可是，少事法引進此項安置輔導制度，究竟有無堅實之理論背景或實證基礎，已非無可疑（註4）？另筆者10年來從實務運作經驗亦深深覺得安置輔導制度經常面臨資源缺乏、司法資源能否滿足福利填補之需求、配套措施不足……等等諸多問題。此外，不少研究更直指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在實際運作上產生不少困境（李自強，2000；何凱維，2003；李錦松，2004；胡碧雲，2005；曾華源、胡中宜、陳玫伶，2006；陳玫伶，2006；彭淑華，2006），且刪除少事法安置輔導相關規定，使其回歸社政安置機制之提議亦時有所聞。

準此，筆者不禁想問：上述問題與困境之產生，究竟是社福機構單方面之準備不周、配合不力、能力不足？抑或安置輔導制度在設計之初，即早已存在結構層面上之缺失？因此，實有必要針對安置輔導制度運作實務深入加以探究，故本文擬以

實務經驗為基礎，先論述現行少事法中安置輔導相關規定在運作上所遭遇之困境，進而提供個人在少年事件審判過程中選擇讓個案接受安置輔導之判斷標準，文末，

則試圖提出對未來保護處分制度改革策進之建議，希望能跳脫出傳統思維，從另一個完全不同之角度來觀察安置輔導制度，並提出批判、解構與重建（註 5）。

表 1 2002 年至 2008 年全國各少年法院（庭）裁處保護處分終結人次統計表

單位：人次

	裁定交付保護處分	裁定應予訓誡並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裁定交付保護管束（含並命為勞動服務）	裁定交付安置適當之機構輔導	裁定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2002 年	13956	1520	6348	189	744
2003 年	12105	1519	5531	174	699
2004 年	10405	1355	4716	141	548
2005 年	9581	1211	4304	159	498
2006 年	9600	1303	4428	168	467
2007 年	9498	1286	4364	149	474
2008 年	10299	1357	4776	146	579

資料來源：2008 年 12 月司法統計月報

## 貳、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運作困境之檢討

茲分別從法律規範與實際執行兩方面，針對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在實務運作上所存在之困境，予以論述說明如下：

### 一、法律規範層面

（一）少事法自從 1997 年修正增列安置輔導相關規定之後，在適用上陸續滋生不少疑義。其中，部分問題曾經提出於少年法院（庭）庭長、法官業務研討會、少年法院（庭）觀護人業務研討中加以討論（註 6），其中，部分疑義業經司法院提出

修正草案加以修正（註 7），但仍舊存留不少爭議問題未能完全加以釐清（例如：適行安置之合法性與必要性？少事法各項處分間任意轉換之可能性？），此無異反證少事法引進安置輔導之初，似乎有過於理想化、疏於全盤考量、思慮不週之處。

（二）少事法條文當中直接敘及「安置輔導」者，僅有 6 個條文（註 8）。倘若再進一步細釋相關內容後可知，上述規定多未直接牽涉安置輔導之執行細節。實際上，有關少事法安置輔導如何執行之細部規範，係分別規定在相關審理則及執行辦法中（註 9）。但是，安置輔導涉及人身自由拘束之程度相當高，相較於其他保護處

分在少事法與相關法律（例如：少年輔育院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行刑進處遇條例）中之規範密度與法律位階，明顯不足且過低，對於接受安置輔導之兒童或少年之人身自由保護恐欠週詳。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9 條第 1 項明定社政安置期間，由主管機關受安置機構代行父母親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亦設有相同規定，而此一規定背後所欲處理之爭議，在個案依照少事法裁處安置輔導期間仍可能發生，但類似規定在少事法中卻是付之闕如，上開規定在個案依少事法執行安置輔導期間能否準用，非無研究之餘地。

（四）從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統計室所提供之統計資料發現，從 2002 年至 2008 年間，安置輔導案件經少年法院（庭）裁定提前免除者共計 43 人次，平均使用之日數為 433.186 日（約 1 年 2 個月）。其次，以臺灣高雄少年法院近 8 年來安置輔導執行終結情形與經過時間為例（請參閱表二），其中免除安置輔導之 43 人次當中，執行期間逾 1 年始裁定免除者之比率竟高達 72.8%；另外，在總計 168 人次安置輔導中，因期滿而終結（即用罄 2 年安置法定期限）者之比率亦多達 22.6%，此無異反徵當初少事法第 55 條之 2 第 1 項有關安置輔導期間之數據（尤其是「2 個月」之規定），似乎缺乏實證根據。

表 2 2002 年至 2008 年臺灣高雄少年法院安置輔導執行終結情形與經過時間

單位：人次

	合計	小於六月	逾六月小於一年	逾一年小於一年六月	逾一年六月小於二年	逾二年
合計	167	30	42	28	52	15
免除	43	4	12	17	10	-
期滿	36	-	-	-	36	-
定執行處分	54	20	22	8	4	-
定執行處分－保護管束	3	1	-	2	-	-
定執行處分－安置輔導	25	11	12	1	1	-
定執行處分－感化教育	26	8	10	5	3	-
另處有期徒刑撤銷安置輔導	1	-	1	-	-	-
撤銷改付感化教育	17	6	6	3	2	-
死亡	1	-	1	-	-	-
延長安置	15	-	-	-	-	15
延長安置－免除	4	-	-	-	-	4
延長安置－期滿	10	-	-	-	-	10
延長安置－撤銷改付感化教育	1	-	-	-	-	1

資料來源：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統計室與調查保護系統資料庫

## 二、實際執行層面

(一) 司法院迄今未自行設置或委辦任何機構直接承接少事法之安置輔導業務，而是由各少年法院（庭）將裁定安置輔導之兒童或少年安置在社政機構中，再透過法院與機構間簽訂委託安置合約書，一年換約一次方式行之，再由少年保護官個別與機構訂定安置輔導計劃作為實際執行之依據。筆者覺得，現行執行方式有深入加以檢討之必要：首先，每一位經裁處安置輔導之兒童或少年，其非行或虞犯行為成因可能截然不同，少年法院（庭）理應針對每一位個案，仔細地與機構討論安置期間之個別處遇內容，但現制之下，卻是以劃一之委託安置合約書作為法院與機構間之規範依據，此舉與少事法期待透過個別化處遇，追求兒童、少年健全自我成長之精神實屬相違。其次，依少事法裁定接受安置之兒童或少年於安置輔導期間所涉及之服務需求內容包羅萬象（註 10）。試想：一紙由少年保護官與機構中執行安置者（甚至是機構內社工員出面）簽訂之輔導計劃書，能否真正含蓋並滿足受安置兒童或少年之需求，亦嫌可議。再者，目前實務上僅有少數機構專門承接少年法院（庭）安置輔導業務，在此等機構中，卻有極高比率並未承接社政安置業務，探究主要原因在於此等機構並未能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中有關安置機構設置之要求，致無法合法立案。試想：若將兒童或少年安置於未經合法立案之機構中，是否能謂符合兒童或少年之最佳利

益，殊非無研求之餘地！

(二) 承前所述，依現行實務運作模式進一步加以觀察，可能會產生下列疑義，例如：上述委託合約書之法律定位為何？在機構當中所有受託執行安置輔導業務有關人員（院長、社工員、生輔員、會計），是否皆符合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稱受託從事公共事務之公務員要件？個案於安置輔導期間遭受其他安置中個案侵害時，受害人能否援引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安置輔導計劃書內容能否據以限制或約束受安置兒童或少年之人身自由？受安置輔導兒童或少年之父母，其親權於安置輔導期間能否正常行使？……等諸多問題，皆有待釐清。

(三) 平時有意願投入社政安置機構之經營者已經不多，相對地，社政機構能夠再撥予少年司法進行安置之床位數量更是少之又少，呈現出供、需兩方間明顯失衡之現象。換言之，能夠（或有意願）承接少事法安置輔導業務之機構床位極為有限，不過，等待接受安置輔導之個案數卻遠遠高過於此（註 11），此等現象惡性循環結果，將衍生出許多問題。首先，部分個案無法順利進入機構安置，在考量不宜遽然返家之情況下，法官可能變更原先之決定，改諭知感化教育之處分，但對照現行感化教育執行內容之僵化，此舉顯然不利於個案之健全成長；其次，目前能否向社政機構爭取到床位以供安置之用，並非經由一個公開、透明之程序，往往需要靠法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與機構間平日所建立之交情來決定，此等運作方式

不僅容易形成資源分配之不公，當個案確係基於特殊情誼或人情關係而爭取到安置床位，日後之監督，恐怕容易出現矛盾之情節。

(四) 如前所述，從 2002 年至 2008 年間，經裁定提前免除安置輔導共計 43 人次，平均所使用之安置日數為 433.186 日，可見安置輔導在現行實務運作上已偏向中、長期，探究其背後原因，不外乎輔導非一朝一夕可立見成效，以及考量兒童或少年之原生家庭尚存在某些問題，因此，機構多不放心太早讓兒童或少年返回原生

家庭，以免抵銷掉機構長期以來在輔導兒童或少年身上所投注之心力。可是，少年法院（庭）針對裁定交付安置輔導個案之法定代理人依據少事法第 84 條規定裁處強制性親職教育之比率（請參閱表三），或是機構主動連結資源對其原生家庭進行協助之比率卻甚低，可以看出法官或機構一方面憂心兒童或少年之原生家庭所存在之結構性問題，但積極加以介入者，卻是微乎其微，兩相對照，形成一個極為弔詭之現象。

表 3 2004 年至 2008 年南部三所法院依少事法裁處各項保護處分與親職教育之對照表

單位：人次

院別 年度  裁定內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應予訓誡、應予訓誡並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224	275	230	232	240	513	564	545	441	535	121	103	128	148	200
因裁處上述處分而對家長裁處親職教育	—	1	—	1	—	—	—	1	3	—	—	—	—	—	—
交付保護管束、交付保護管束並命勞動服務	257	281	232	254	324	562	434	368	366	357	150	144	182	228	173
因裁處上述處分而對家長裁處親職教育	4	2	7	26	10	1	1	3	1	3	9	6	9	5	—
交付安置適當之機構輔導	5	3	8	5	11	19	21	23	31	12	7	12	14	7	8
因裁處上述處分而對家長裁處親職教育	1	—	3	—	3	1	—	—	2	1	1	—	—	—	—
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28	17	25	19	45	81	61	33	51	67	21	16	15	30	22
因裁處上述處分而對家長裁處親職教育	3	1	3	5	—	—	1	—	—	2	—	2	—	—	—

資料來源：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統計室。

## 參、個人選擇裁定安置輔導之判斷標準

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除保護色彩之外，尚有期待透過環境之轉換，試圖使兒童或少年在具有正向功能之機構中調整其生活步調與秩序，逐漸回歸常軌之用意，因此，家庭功能能否發揮、兒童或少年之成長環境有無調整之必要，自屬決定是否對個案裁定安置輔導之主要判準。但是，如果安置輔導只需考量上開要件，筆者不禁要問：為何表二之統計數字卻顯示，近8年來因故撤銷安置輔導而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比率竟多達10.1%（註12）！

事實上，筆者10年前輪調至少年法庭辦理少年事件之初，適逢少事法大幅修正之初，當時確曾將安置輔導誤解為感化教育之前階處遇，以致於讓許多原本人格特質極需矯治之個案送往機構安置。但不久後隨即發現，此等個案在機構內不斷滋事（包括：逃離機構、竊盜、傷害、霸凌、性侵害……），令機構疲於奔命、焦頭爛額，連帶嚴重影響機構中原本已穩定之其他個案。當筆者驚覺事態嚴重後，深切反省究竟適合安置輔導之個案，是否單純以家庭失功能作為判斷依據即可，抑或尚有其他重要之因素漏未考量？事後，藉由先前實際操作安置輔導所累積之失敗經驗，輔以反覆思索少事法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宗旨，逐漸摸索出定裁處安置輔導與否之判斷標準。亦即，決定宜否裁處安置輔導之處分，除上述家庭因素之考量外，還需

注意另一項重要之關鍵因素——即個案本身之性格問題。換言之，縱使確定兒童或少年之偏差行為是導因於家庭因素，而認為其成長環境有加以調整之必要，但尚需進一步確認個案之人格特質並不需要加以矯治之情況下，始宜考慮採取安置輔導措施。準此，倘若個案僅需單純調整成長環境，提供適當之安置機構，即可有利其健全自我成長，筆者認為的確適合採取安置輔導之處遇；反之，若兒童或少年除調整其環境之外，尚需進一步矯治其性格（註13），始能達成健全成長目標者，筆者則反對採用安置輔導之處遇。

事實上，當社政機構之輔導人員或社工員面對機構內同時存在不同來源之案主（即自願安置、社政安置或少年司法安置個案）時，往往無法精確區分其間之差異，進而正確適用相關法律規定，更遑論依個案實際不同之需求施以不同輔導。有鑑於此，若將性格尚需矯治之個案置於機構中，機構內部管理會出現何種亂象，殊難想像（註14）！因此，筆者衷心呼籲實務工作者（特別是法官與少年調查官）運作此一制度時應十分審慎，否則，誤用安置輔導制度對於個案與機構所產生之負面影響，恐怕尤甚於安置所能得獲得之利益。

## 肆、安置輔導制度之改革建議

如前所述，篩選出不需要矯治其性格，而僅需單純調整環境之兒童或少年進入社政機構接受安置輔導，乃筆者因應現實狀況下所體驗出之判斷標準。但實際

上，筆者更傾向主張將安置輔導相關規定從少事法中全部刪除，讓符合筆者所指適於安置之個案，完全回歸社政體系（註15）。果如此，一方面社政體系必須強化其福利輸送內涵，提供高品質之安置輔導服務，能讓每一位進入社政安置之個案得以藉由環境之調整，進而健全地成長；在另一方面，由於採取上述標準，勢必導致許多原本被裁定安置之個案可能轉而流向感化教育機構，而對照現行感化教育處分種類之多樣性不足與執行內容之僵化，筆者認為有必要針對感化教育制度加以大力改革。筆者有鑑於提昇安置機構內部服務效能之學術研究與研討會論文已不在少數，茲不復贅，以下僅針對前述有關建議將少事法安置輔導規定刪除之理由詳加論述，並扼要描繪出筆者心中所期待建構之感化教育處分願景。

### 一、筆者主張將安置輔導回歸社政體系之理由：

（一）假如兒童或少年之原生家庭並無失功能之情形，少年司法似無採取安置輔導予以積極介入之必要；反之，倘若家庭有失功能之情形，理應先由社政單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給予適當之安置，少年司法則僅需從旁提供協助即可，實無必要在少事法中保留安置輔導制度。

（二）少事法安置輔導處分中有少年保護官之介入，更明定有相關強制措施（例如：留置觀察、撤銷安置輔導，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反觀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所規定之安置則無類似之制度設

計，此等不同，正突顯社會福利與少年司法本質上之差異。筆者認為社政與司法兩系統各有其所長，亦各有其不足，在促進少年健全成長之目標下，自當截長補短，密切配合，彼此分工，未必一定要在少事法中強行加入原屬社政領域之安置輔導制度。更何況，少年司法仍具有一定之負面標籤作用，因此，期待透過對於安置機構中個案增加司法強制與約束力為由，作為安置輔導保留在少年司法中之理由，恐屬本末倒置。

（三）回顧 1997 年少事法大幅修正前之少事法第 51 條第 3 項已有徵得觀護人之意見，將少年交付少年福利機構保護管束之相關規定（註 16），筆者認為在本質上與修法後之安置輔導功能、用意相近似，只是在舊法（即 1997 年修正前）階段，少有法官、觀護人注意到此項規定進而妥適加以運用而已。因此，縱使當初無安置輔導相關條文之增訂，依少事法原有規定，仍舊可以達到實質安置之目的。

（四）或許會有人指出：建置一所安置機構根本非難事，現在各縣市閒置學校眾多，只要選擇幾處校地稍加整理，待相關人員一進駐，便可開始接收少年法院（庭）所裁定之安置輔導個案。但筆者卻認為安置機構硬體設備之籌建並非主要之困難，反而是正確之開案評估、完善之管理體系、充足之輔導人力、充實之專業訓練、多樣化之服務提供、豐沛之資源連結等方面能否齊備，方屬安置機構運作成敗之最大關鍵！相較於其他在第一線實地從事兒童、少年保護業務之非營利組織或社團法

人，司法院或各級法院除擁有法律之專業能力外，既不懂社工、社福、醫療、諮商、輔導、管理等專業知識，更缺乏機構管理之實務經驗，可以預見，少年司法單位若自行率予成立安置機構，聘用一些毫無經驗者負責安置業務，筆者預言，不出數日，弊端、問題必接踵而至（註 17）。

（五）由於司法院並未自行籌設安置機構，而係將安置輔導業務委託社政機構協助執行，再加上少事法中訂有安置輔導之明文，使得社政單位順理成章地認為少年司法安置業務非其所轄，此舉不僅衍生諸多不合理現象（註 18），更讓安置輔導制度成為社政單位卸責之導火線。因此，筆者認為將安置輔導業務由社政機關統籌辦理，透過挹注與連結相關資源，以及提供法律上之一切必要協助，不僅能藉由社政體系使受安置個案更直接、有效地獲得福利服務資源，亦可避免許多失衡現象之產生。

（六）現行法規內容涉及兒童、少年事宜，且法律條文敘及「安置」字樣者，參照學者張紉(2000)、詹火生、孫壹鳳(2002)之分類方式，可概略區分為三大類：一為少年保護體系類法規（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一為防制少年性剝削體系類法規（例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另一則為少年非行輔導體系類法規（即少事法）。其實，不僅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存在不少爭議，就連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中之安置規定在實務運作上始終存在違憲之質疑（註 19）。從而，如果能讓所有與安置有關之措施單純地回歸至第一類，

完全由社政單位接手，不僅可以讓責任劃分清楚，大幅免去現行實務上之眾多爭議，更可讓目前社政安置與少年司法安置併存在機構內之混亂現象獲得妥善之解決。

（七）司法院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舉辦安置輔導制度公聽會，在會中，柯耀程教授提供書面意見指出：「……固然少年之所以產生非行行為，在某種意義上，可將其視為社會環境之『犧牲者』，而視為『類被害人』，不過，從法律規定之具體適用關係上，仍必須從具體客觀之非行與偏差行為來加以觀察……」。對此，筆者擬從不同角度加以觀察，蓋依犯罪學之研究分析指出：家庭、學校、個人與社會係導致兒童或少年出現非行或虞犯行為之關鍵因素，且上述因素又多交迭互相影響。假使少年調查官在審前調查中發現，兒童或少年非行或虞犯行為成因源自於家庭，進而評估如果能將其成長環境加以調整，其等不良行為便可獲得改善，試想：此種情形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標示需予以介入協助、輔導或安置之個案兩者間在本質上又有何差異？換言之，即便兒童或少年客觀呈現於外者為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或其他虞犯情節，吾等社會為何不能更為包容地直接將其視為社會環境之「犧牲者」，而逕視之為「被害人」，而非必將其歸為「類被害人」不可？如此，一般社政安置所欲達成之目標，與少事法安置輔導之目標又有何差距（註 20）？

（八）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3 條規定，負責社福機構之輔導、



監督、評鑑與獎勵等事宜，對於各機構屬性、專長與適合安置之對象應知之甚詳，相較於此，各少年法院（庭）則缺乏此一監督機制。準此，如果能把安置輔導業務，統一移轉由專司社福機構監督之主管機關負責，應更能符合兒童或少年最佳利益目標之達成。何況，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3 條第 1 項設有家庭處遇計劃之明文，同條第 2 項、第 3 項更分別臚列處遇計畫所能含蓋之內容（註 21），反觀少事法中則僅有第 83 條強制性親職教育之規定，兩相比較，前者所含蓋之範圍較廣，且更加週延。從而，讓適合安置之個案回歸社政體系中，在現行法規運作之下，顯然更能獲得較佳之福利服務。

（九）論者或云：現行保護處分中，不論是機構式之感化教育，抑或非機構性之訓誡並予以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在作用上似乎是趨向於二個極端，反觀安置輔導即是一種半機構性、具有個別化與彈性之措施，藉由場所之提供與調整，隔絕非行負面因子，有利於少年修正偏差人格，故安置輔導乃基於此種構想下，所提出之一種半自由式、半機構式保護措施（註 22）。然而，筆者欲提出質疑者是：「半自由式」保護措施之理念，在現行實務運作下，已與機構式、監禁式之質實相去不遠。換言之，從各機構執行少事法安置輔導之現況觀之，受安置兒童或少年之生活幾近於「不自由式」。其次，依一般法律原則而言，對於自由拘束之程度愈高者，其法律規範密度自應相對愈高。倘若將安置輔導定義為「半自由」之保護措施，事實上已

隱含「半不自由」之內涵。正由於安置輔導對於自由之拘束明顯較訓誡、訓誡並予以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保護管束並命為勞動服務等保護處分為高，其法律規範密度與層級之要求理應高於上述各項保護處分。不過，綜觀現行安置輔導與其他保護處分之規定內容不難看出，安置輔導相關法規之層次顯然過低，規範密度尤顯不足。再者，「半機構式」措施之設置理想雖名曰保護，但既然無法脫去司法之外殼，標籤之負面作用必如影隨行地伴隨而至，此觀察許多司法安置機構內兒童或少年欲外出就學時，屢遭當地學校刁難，甚至遭拒絕即可見一斑（註 23）。除此之外，目前一般承接少事法安置業務之機構與社區之互動並不多，倘如此，當初倡議藉由少事法安置輔導制度落實社區處遇之目標似乎難以實現。上述各項問題與困境，殊值贊成少事法中保留安置輔導制度者三思。

綜上所述，少年司法安置輔導既然面臨如此多棘手問題，而讓其回歸社政安置又有諸多便利及可行性，故筆者主張刪除少事法中之安置輔導規定，對於單純需要調整環境之非行兒童或少年，由少年法院（庭）協調社政單位出面負責辦理社政安置。至於少年司法此時所應從事者，即從旁提供必要之協助、監督與約束，與社政單位分工合作，共同為達成兒童或少年健全成長而努力。因此，筆者建議少年法院（庭）應針對交付社政安置之個案裁處交付保護管束（或保護管束並命勞動服務）之處分予以適當介入。至於對於不僅要調

整環境，尚需矯治性格者，則宜採感化教育之處遇行之（詳後段詳述）。

## 二、感化教育之改革方向

由於筆者建議將少事法中有關安置輔導之規定全數加以刪除，讓所有符合安置之個案回歸社政體系。同時，依筆者前開有關篩選個案接受安置輔導之標準，勢必形成原本依一般觀念可能裁處安置輔導之個案，將來會往感化教育或社政安置流動之現象，可以預見，將來非行少年經裁定感化教育之比例必定大幅攀升，為因應此一現象，勢必需要將現行僵化之感化教育執行方式澈底加以改革，以下擬分別就感化教育之現況與改進意見論述之。

### （一）感化教育執行現況概述

目前，我國共有四所與少年有關之感化教育執行單位，從北而南分別是：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註 24）、新竹誠正中學、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及高雄明陽中學。前三者均為感化教育執行機構，但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新竹誠正中學僅收容男性少年，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則男、女兼收（註 25）。至於高雄明陽中學係專門負責男性少年刑事判決確定案件之執行（註 26），而女性少年經判處徒刑者，目前多直接由各少年法院（庭）轄區內之女子監獄負責執行，或送至臨近轄區內之女子監獄執行。

由於某些因素考量，導致上述四所執行單位之設置各自適用兩套不同之標準（註 27），正因為兩套設置體系之差異，形成同屬執行感化教育機構之機關，卻有

不同組織、法規適用之情形。另外，就現行感化教育之執行內容加以觀察，以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為例，常規遵守訓練、法治教育灌輸及義務教育之完成乃其主軸，其他兼及才藝訓練、技職訓練、生命教育、生涯及職業探索及情緒探索等課程。至於新竹誠正中學則以課程教育為主，區分為國中部與高中部，在正常課程外實施技藝輔導與技能訓練。

筆者從實際走訪各感化教育執行機構之經驗中發現，現行感化教育之執行普遍存在下列缺失：機關內之工作人員與收容少年比率偏高、個別化處遇理念無法落實、受感化教育處分人能參與技職教育之比率太低、採用受刑人累進處遇方式計算受感化教育者之晉級標準似與少事法所揭櫫之精神未能相符、醫療或其他特殊處遇資源連結困難。其中，尤其以個別化處遇不足一項最值得商榷。換言之，現行感化教育之實施內容偏向制式化設計，似缺乏個別、適性之處遇，實難達成處遇個別化及處遇完整性之目標。

筆者認為會造成此一失衡現象，主要肇因於現行感化教育機構全數隸屬於法務部，卻是負責少年司法機關所裁定之感化教育個案，少年法院（庭）在無直接監督隸屬之情況下，對於感化教育機構內部如何具體實施處遇內容難有置喙之餘地，即便法官在裁定主文中明示具體之處遇內容（例如：定期戒護就醫、心理治療、協助取得一定職訓證照等），各執行單位亦未必有人力與意願加以配合。長此以往，形成遭裁處感化教育之少年在接受感化育之期

間，僅能消極地配合機構所提供之處遇內容（甚至於只能達到隔離不適當環境之消極目的），使得當初法官裁定令少年進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初衷大打折扣。

## （二）具體改革建議

有鑑於現行感化教育在執行層面上存在許多缺失，司法院已擇期於 2009 年 7 月 27 日舉辦少年矯正機制公聽會，提出相關討論議題，希望廣納各方意見作為日後修正少事法之參考。而日前，臺灣高雄少年法院亦率先與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協議試辦處遇更新之計劃，希望能改變上述制式僵化之執行內容。只不過，無論司法院或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所作之各項努力措施，仍未脫離現行制度之框架，改革成效恐怕有限。就長遠目標而言，筆者期待整個感化教育體制能作出大幅度之變革，亦即，現行感化教育所存在之各項缺失，必須做出結構性之調整，方能有所因應，茲略述筆者理想中之感化教育整體規劃如下：

1.重新考量感化教育之期間：如先前筆者所述，宜接受感化教育者除需調整環境外，尚需矯治其性格，因此，為達成少年健全成長目標，筆者認為少事法第 53 條有關感化教育執行期間不得逾三年之規定應予修正，宜適度予以放寬，授權由法官在裁定書中諭知執行年限，必要時尚得予以延長（註 28），或變更為其他種類保護處分，以活絡各種保護處分間相互流動之可能性。

2.設置多樣化之感化教育處遇機構：經裁處感化教育之少年，非行成因可能各不相同，需要加以矯正、協助或治療之重點亦不一致，為達到處遇各別化之目標，負責執行感化教育之機構自當有所因應。筆者主張宜設置各種性質不同之專業感化教育機構，其中包含：軍事化管理之感化教育機構（例如：接受嚴格之新兵入伍訓練、體能訓練）、藥物處遇感化教育機構、勞動服務之感化教育機構（例如：從事資源回收、植物人安養中心、荒地開墾等公共服務之勞務）、技職訓練之感化育機構、醫療感化育機構、教育式感化教育機構（例如：現行之矯正學校）（註 29），而上述各類感化教育機構必須各自設計不同種類之專業課程，供少年法院（庭）法官於執行指揮書中加以選擇、組合。

3.案件交付執行時，法官必須將日後應執行感化教育之內容具體化：感化教育之裁定確定後，待送執行之前（註 30），少年法院（庭）法官宜再透過開庭程序徵詢少年、法定代理人對於日後執行內容有何意見，席間，可邀請感化教育執行機關或相關機構（例如：醫療機構、特殊教育機構或專業輔導機構）人員列席參與討論，並請少年調查官擬出感化教育執行建議，綜合加以研析後，由法官在執行指揮書中詳述具體應執行內容（註 31）。而感化教育執行機關對於指揮書中所記載之內容，則必須確實加以執行，以作為日後是否停止或免除感化教育，或改令入中途之家之判斷依據。

4.設置中途之家：有鑑於受感化教育

執行少年，甫從完全封閉、禁監之機構離開，無法立即適應完全自由之生活型態，或者是其原生家庭尚未準備就序，甚或因就學、就業之需，不宜令其遽然返回家中，而反觀現行制度下，卻僅有停止感化教育將所餘之執行期間交付保護管束一途，故筆者建議設置中途之家暫時接受此類少年，由專人對其生活作息自我管理能力進行教導，配合就學或就業等方案，俾增加與社區互動之機會，為日後返家預作準備，同時施以密集監督與評估，迨達一定考核標準後，再令其返家，倘若少年在中途之家表現欠佳，則令其返回感化育教育機構繼續接受感化教育。

5.凡裁定感化教育之案件，除有特殊情形外，均應針對法定代理人併諭知強制性親職教育：當兒童或少年因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爲，被裁判前往感化教育機構接受感化教育，原先導致少年偏差行爲產生之家庭環境，如果未能利用此一機會同時進行改善，將來少年結束感化教育返回原生家庭時，仍有極高之再犯可能，更可能使感化教育期間之所有努力成果化為烏有。因此，筆者建議：對於少年裁處感化教育時，原則上應同時對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實施親職教育輔導，除非有特殊情事，或經評估無必要者，始得免予接受該項輔導（註32）。

6.明定對於兒童不得裁處感化教育：由於兒童之年齡尚輕，其人格成長正值需要家庭提供適當保護階段，縱使出現偏差行爲，基於福利先行與比例原則之考量，

仍應先透過社政單位提供必要協助入手，實不應遽令入感化教育機構接受感化育，故筆者傾向主張在少事法中增列對於兒童應優先採取各項社會福利措施，或其他種類保護處分，不得令其進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規定。

## 伍、結語

少事法於1997年全面修正時，導入具有福利色彩之安置輔導制度，一方面係考量處遇之多樣性；一方面則是希望建立轉向機制，讓少年能儘早從司法回流至社會、家庭。但筆者回顧自己操作此一制度之心路歷程，從不知誤用、濫用、害怕而不敢使用，至目前之謹慎評估運用，前後10年之運作、嘗試、反思與修正，猶如歷經起、承、轉、合之起伏轉變。

筆者提供上述經驗與意見，指出少事法安置輔導運作之困境，目的在期望各界正視此一制度設計所存在之問題，協助釐清安置輔導制度之目的是否真能實現，讓此一制度不流於形式，更期待安置制度之妥適運作，能夠真正達成協助兒童及少年健全成長之目標。至於本文中有關刪除少事法中安置輔導相關規定，讓安置回歸社政體系，以及改革感化教育之相關建議，純屬個人實務運作摸索心得，思慮恐有未周之處，殷切期盼對於本文論述有不同意見之各界先進，不吝惠予斧正。

（本文作者現為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法官）

## 📖 註 釋

- 註 1：在國內，社福界與司法實務界對於「轉向」與「轉介」之用語十分混淆，有關轉向制度概念之說明，請參閱施奕暉(2004)「少年轉向制度的概念、沿革與理論基礎」一文。
- 註 2：與安置輔導相關之研究主題包括：轉向制度之研究（高偉文，1996；施奕暉，2001）、安置輔導制度理念之檢討（吳幸玲，2003；張菁，2006）、少年司法工作者建議或裁定安置輔導之標準（李自強，2001）、社福機構對於安置輔導制度之因應（郭靜晃、黃志成，1987；郭靜晃、曾華源，2000；胡中宜，2001）、安置機構服務內涵之論述（陳玫伶，2006）、安置機構執行現況與檢視（曾華源、王篤強、李自強、陳玫伶，2004；曾華源、胡中宜、陳玫伶，2006）、安置機構內少年適應之分析（黃麗娟，2001；蔡明珠，2005）、安置機構內少年福利需求與資源網絡之建構（李自強，2004）、機構內社會工作者之訓練督導（李自強，2009）、安置機構團體工作策略行動研究（李易蓁，2005）……等等。
- 註 3：李茂生教授(2004)於「轉向制度的立法意旨與未來展望」一文中曾指出：「所謂的 diversion 是指將現在刑事程序所處理的對象（事件或案件）切離（廣義）刑事司法體系的機制。而這種切離的動作，有些是發生在刑事程序啟動之前，有些則是發生在刑事程序正在進行的過程中，當然也有些是發生在刑事程序的最後階段。此外，當轉向的機制發動後，對於該當事件或案件，國家可以不再進行任何的干預（或協助），反之，國家也可以透過另外一種社會系統（通常是福利系統）積極地繼續干預該當事件或案件」。
- 註 4：監察院(2000)專案調查報告中即曾明確指出：當初少事法中新增安置輔導處分時，在立法理由中完全未有任何深入論述，以致於各法院對於安置輔導之決定標準不一。
- 註 5：筆者始終認為，法律規定來於立法者理念、政策之具體化，但法律條文所規定之內容卻未必盡皆妥適，甚至可能窒礙難行，此端賴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在實踐法律之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與檢討，將立法者在立法之初所未預見或慮及之問題一一加以指出，讓法律有接受檢視之機會，相信必定能使當初立法理念、政策真正地獲得實踐。
- 註 6：曾經提出供討論之問題例如：少年於安置輔導期間表現良好，認無繼續安置輔導之必要，但仍須由專人施予輔導，可否改裁定交付保護管束？少事法第 42 條安置輔導處分究係介於保護管束與感化教育之中間處分，或係解決家庭失功能少年之

社福措施？

- 註 7：司法院於 2006 年間，延請一、二審部分法官與相關業務人員組成少年事件處理法研修小組，經 14 次會議，於 2007 年 4 月完成第一階段研商，並在審慎整理確認後，完成修正草案初稿。該修正草案重點包括：「九、調整、修正執行保護處分相關規定，如：少年保護官介入安置輔導之執行、留置觀察免予執行等，以求規定完整並利實務運作」，引自 2007 年 8 月 9 日司法週刊第 1350 期。
- 註 8：少事法中明確提及「安置輔導」之條文分別為第 42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2 條第 1 項、第 54 條第 2 項、第 55 條之 2、第 58 條第 1 項及第 61 條第 9 款。
- 註 9：與安置輔導執行內容有關之行政命令規定包括：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 41 條、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第 19 條至第 23 條、第 32 條、第 39 條、第 40 條等條文。
- 註 10：受安置輔導兒童或少年之需求包括：就學輔導、生涯規劃、特殊教育、職業訓練、醫療照顧、心理治療、家庭諮商、家庭重建、休閒服務……等。
- 註 11：有學者會指出：從前開表一之數據顯示，平均每一年裁定交付安置輔導約 150 人次，可見一般而言，全國安置輔導之需求量應即如此，進而建議：直接由司法院編列預算經費，在北、中、南、東各設置一所少年司法安置機構，負責執行安置輔導業務，即可解決目前諸多實務上之困境！但筆者對上述意見持保留之態度，蓋表一中所呈現之安置輔導人次，精確言之，應係全國社政機構在一年之中能夠提供予少年法院（庭）執行少事法安置輔導之人次。事實上，倘若社福機構能大提供充足且適當之床位來協助少年法院（庭）執行安置輔導，則筆者確信表一中安置輔導欄所呈現之數據，絕對會遠遠超過 150 人次！此外，每位受安置輔導兒童或少年之非行或虞犯行為成因多有所不同，若未能考量個別差異，僅為圖執行之便，將兒童或少年混雜置於同一機構中，對兒童或少年所造成之不利益，恐怕會遠超過安置所能獲得之好處。
- 註 12：以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為例，從 2002 年至 2007 年間接受保護管束執行之少年，於保護管束執行中經裁定撤銷保護管束，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百分比則為 3.41%（資料來源：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統計室），兩相比較，即可看出，法官對於當初裁定安置輔導之抉擇，容有商榷之餘地。
- 註 13：至於所謂「性格需矯治」，依筆者個人經驗觀察，舉凡有品性疾患者、對於團體生活規範服從性極差者、精神狀況明顯異常者皆屬之。而對於此等既需調整環境，又需矯治性格者，筆者則認為宜裁處感化教育之處分，不過，現行感化教育之實施方式，有徹底加以改革之必要，容於後段肆、中詳加論述。
- 註 14：筆者形容，將性格待矯正之個案安置於機構，將猶如將一匹惡狼放入羊群中！

- 註 15：張菁(2006)「少年事件處理法安置輔導制度之運作及評析」一文中提出：對於有安置必要，但情節尚非嚴重之非行少年，考慮直接以少事法第 29 條之規定，及早轉向由社政單位執行之建議，筆者認為，此項建議，實質上與本文希望安置輔導回歸社政體系之思維亦相近似，只不過，少事法第 29 條規定仍有其要件上之限制（需限於情節輕微之案件），無法因應轉向之所有需求。
- 註 16：1997 年修正前之少事法第 51 條規定：「對於少年之保護管束，由觀護人掌理之；觀護人應告少年以應遵守之事項，與之常保接觸，注意其行動，隨時加以指示；並就少年之教養、醫治疾病、謀求職業及改善環境，予以相當輔導（第 1 項）。觀護人因執行前項職務，應與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為必要之洽商（第 2 項）。少年法庭得依觀護人之意見，將少年交付少年福利機構、警察機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少年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管束，受觀護人之指導（第 3 項）」。
- 註 17：或許，這正是少事法修正迄今已逾 10 年，少年司法尚不敢輕易嘗試設置任何一所安置機構之主要原因，而此一現象無異反徵：歷經 10 年之運作，當初立法者所建構由少年司法自行設置安置輔導機構負責安置事宜之理念，根本無法落實！
- 註 18：筆者親身所經歷之不合理現象，例如：社政機構基於種種因素考量（例如：機構屬性、床位不足、輔導人員對於具有偏差行為之兒童或少年輔導專業能力不足...等），經常拒絕少年法院（庭）所委託評估之個案；另外，亦曾出現原本由社政安置之兒童或少年，因觸犯刑罰法律或有觸法之虞，經過少年法院（庭）裁處安置輔導之處遇後，社政單位基於預算考量，或社工員認為已有少年司法機關接手為理由，隨即評估結案之情形，此舉可能導致原本來自於社會福利體系之相關福利服務輸送中斷；又現行少年司法安置輔導與社政安置兩者併行之情況下，時常出現同一社政機構內存有不同安置管道之兒童或少年，此舉對於機構內管理人員適用法律造成相當大之困擾，筆者即曾經親耳聽聞某機構內社工員向筆者表達：「非常希望自己機構內透過社政體系安置之兒童或少年，能有機會觸犯刑罰法律，以便少年保護官與少年司法之強制約束能夠積極介入」，此等言詞出自於一名助人專業工作者之口中，實屬一大諷刺！
- 註 19：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安置輔導制度可能涉及之違憲爭議，請參閱林超駿(2004)「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何明晃(2009)「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安置、保護制度評析」；林彥均(2008)，「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中『安置』措施之合憲性檢討」。
- 註 20：事實上，此項觀點亦正與筆者先前所主張裁處安置輔導之判斷標準相互呼應。亦

即，筆者主張適宜安置之對象，乃不需矯治其性格，只需調整其環境者，而此等適宜安置之對象本質上既然僅需調整環境，自與一般透過社福體系進行安置之對象相近，將兩者合流為一，顯無實際執行上之困難，更可以讓此等兒童或少年藉由社政安置真正獲得社會福利服務之輸送。

註 21：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3 條第 2 項、第 3 項分別規定：處遇計劃之內容包括家庭功能評估、兒童少年安全與安置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關之扶助及福利服務方案（第 2 項）。處遇計畫之實施，兒童及少年本人、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第 3 項）。

註 22：此段內容整理自柯耀程教授提供予司法院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舉辦之安置輔導制度公聽會書面意見。

註 23：有關臺南地區某一所國民中學，拒絕當地安置機構少年入學之相關新聞，請參閱 2007 年 11 月 11 日聯合報第十版、2007 年 11 月 30 日自由時報第十版、2007 年 11 月 30 日蘋果日報第十版。

註 24：另一常見而容易混淆之名稱為少年觀護所，少年觀護所係根據「少年觀護所設及實施通則」設立，職司少年保護事件少年之收容，以及少年刑事案件審理中少年之羈押事項（少年觀護所設及實施通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目前，我國各少年法院（庭）所轄範圍，並未各自對應有獨立之少年觀護所，部分轄區之少年收容或羈押等業務，係由分監、看守所或戒治所兼辦。

註 25：目前，負責男性少年感化教育之執行機關雖然有三處，但現行實際運用情形如下：全國各少年法院（庭）裁處交付感化教育之男性少年，先依轄區送往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苗栗以北之縣、市及宜蘭縣、花蓮縣）或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臺中、南投以南之縣、市，以及臺東縣、澎湖縣、金門、馬祖地區），待執行一段期間後，再由新竹誠正中學分別前往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遴選適合入學之學生，轉往該校就讀。

註 26：須提醒者是，由於監獄行刑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受刑人在 18 歲以上未滿 23 歲者，依其教育需要，「得」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至完成該級教育階段為止，因此，並非全國所有遭判處有期徒刑之少年皆收容在高雄明陽中學。

註 27：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係依據少年輔育院條例而設置；新竹誠正中學與高雄明陽中學之設立則是依據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註 28：倘若少事法第 54 條第 1 項關於保護處分之執行，至多執行至滿 21 歲為止之規定未加以修正，則筆者即便主張可裁定延長感化教育之期間，但 21 歲仍為感化教育處分執行之上限。



- 註 29：以日本為例，負責矯正教育之機構少年院即區分為初等、中等、特別、醫療四類，分別收容不同屬性之對象，值得我國借鏡參考。
- 註 30：筆者之所以不主張在案件審結之裁定中，便明確宣示日後感化教育應執行之內容，主要原因在於法官諭知感化教育之裁定後，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以尚得於法定期間內依少事法第 61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提起抗告，在有被害人之場合，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亦具有同樣之抗告權利，案件未必會立即確定並送執行，甚至於案件經抗告後，仍有可能遭上級法院撤銷發回或改判，因此，似無庸過早將具體內容明示。再者，待案件確定之後，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對於案件已無法再爭執，相對而言，通常較能理性地、平心靜氣地面對往後如何執行之規劃，故在此一時點針對感化教育執行內容，邀集相關人員或機關詳加討論，顯然較容易達成共識，而且此時所連結之資源連結，亦較能明確而有效率。
- 註 31：舉例言之：命少年甲必須先接受為期半年之軍事化感化教育，再進入教育式感化教育，至取得國中畢業證書為止；命少年乙接受一年半之軍事化感化教育後，繼而接受技職訓練感化教育，至取得二項以上丙級技術士檢定證書為止；命少年丙接受二年之醫療感化教育，期間需配合精神科醫師定期門診，並接受心理師之諮商與家族治療；命少年丁接受一年半之藥物處遇感化教育，再進入勞動服務之感化教育機構從事一年之公共勞動服務。
- 註 32：此項建議可從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第 4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即「少年法院、少年保護官及其他執行保護處分者，應督促受執行中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受執行人之人善盡親職教養之責」）獲得支持！

## 📖 參考文獻

- 司法院(1999)。〈少事法有關安置輔導制度公聽會會議書面資料〉。
- 李自強(2000)。《觸法少年安置輔導現況及其影響因素》。南投：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自強(2001)。〈少年司法工作人員建議或裁定安置輔導之研究〉，《犯罪學期刊》，8，頁 1-26。
- 李自強(2004)。〈從安置輔導少年需求論資源網絡建構一文〉，《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7，頁 165-179。
- 李自強(2009)。〈安置輔導工作者訓練與督導現況初探〉，《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1(1)，頁 109-128。

- 李易蓁(2005)。〈強制安置機構團體工作策略之行動研究〉，《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9，頁 213-230。
- 李茂生(2004)。〈轉向制度的立法意旨與未來展望〉，發表於「兒童及少年審前轉向與安置輔導實務研討會」。臺北：中華民國觀護協會，2004 年 9 月 1 日。
- 李錦松(2004)。〈安置輔導制度之檢討與展望〉，發表於「兒童及少年審前轉向與安置輔導實務研討會」。臺北：中華民國觀護協會，2004 年 9 月 2 日。
- 何明晃(2009)。〈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安置、保護制度評析〉，收錄於《少年司法實務論叢》，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63-80
- 何凱維(2003)。《非行少年司法轉向安置輔導機構保護處分司法單位與社福機構之契約關係—以南投地方法院與南投家扶中心為例》。臺中，靜宜大學青少年與兒童福利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幸玲(2003)。〈從兒童及少年觸法行為解析兒少安置輔導之處遇〉，《社區發展季刊》，103，頁 132-143。
- 林彥均(2008)。〈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中『安置』措施之合憲性檢討〉，《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第 47 期學員法學研究報告》，頁 215-230。
- 林超駿(2004)。〈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憲政時代》，29(4)，頁 541-592。
- 施奕暉(2001)。《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轉向制度的探討》。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奕暉(2004)。〈少年轉向制度的概念、沿革與理論基礎〉，發表於「兒童及少年審前轉向與安置輔導實務研討會」。臺北：中華民國觀護協會，2004 年 9 月 1 日。
- 胡中宜(2001)。〈零合競爭 V.S.合作夥伴：整合司法體系與少年福利體系因熱轉向安置處分之策略研究〉，發表於「司法保護轉向、機構安置輔導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民國 90 年 11 月 6 日。
- 胡碧雲(2005)。《少年安置機構生活輔導之工作適應—以宜蘭縣為例》。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偉文(1996)。《少年事件轉向處分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玫伶(2006)。〈兒童與少年機構安置服務的內涵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14，頁 324-335。
- 郭靜晃、黃志成（民 87）《少年福利機構如何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轉向制度之研究》。臺北：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郭靜晃、曾華源(2000)《少年司法轉向制度之因應》。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曾華源、王篤強、李自強、陳玫伶(2004)。《少年安及教養機構服務類型與需求整體規劃

- 研究》。臺中：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報告。
- 曾華源、胡中宜、陳孜伶(2006)。《法院裁定少年轉向安機構服務之研究》。臺中：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報告。
- 張菁(2006)。《少年事件處理法安置輔導制度之運作及評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紉(2000)。〈青少年安置服務福利屬性之探討〉，《臺大社工學刊》，2，頁 191-215。
- 黃麗娟(2001)。《保護處分安置輔導少年機構內生活適應之探討》。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淑華(2006)。〈保護為名，權控為實？—少年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觀點分析〉，《東吳社會學報》，15，頁 1-36。
- 詹火生、孫壹鳳(2002)。〈我國少年安置服務政策分析〉，《國政研究報告》，編號：社會(研)091-016 號，網址：<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1/SS-R-091-016.htm>，造訪日期，2009 年 7 月 20 日。
- 蔡明珠(2005)。《影響安置少年院內生活主觀感受因素之研究—以花蓮縣少年安置機構為例》。花蓮：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2000)。《少年保護制度成效之簽討專案調查報告》。